

# 憲庭力會台字13187號 專家諮詢意見

東海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劉芳伶  
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律師

20220419@司法院

# 報告題綱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題綱爭點一)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題綱爭點二)
- 三、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題綱爭點三)
- 四、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機制與實益  
(題綱爭點四)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 \* 題綱爭點一：

辯護人之辯護權是依附於被告之訴訟權？或獨立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例如律師職業自由或其他相關之基本權）？

### \* 回覆意見一：

以結論而言，本意見書認為，辯護人之辯護權並非係依附於被告（含犯罪嫌疑人，以下同）之訴訟權，而係獨立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其依據應併同求諸於我國憲法第16條與第8條所定。



## 報告題綱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一) 日本之問題狀況

(二) 我國之相關議論


(三) 分析

(四) 結論

(五) 補論：關於律師職業自由

(我國憲法第15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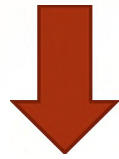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 (一) 日本之問題狀況


日本國憲法第34條、第37條第3項



「充分辯護」(full defense)  
+ 「實質辯護」(effective defense)



受「有效辯護」之權利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 （一）日本之問題狀況


- 日本最高法院2005年裁定與辯護人定位
- 本裁定重點：肯認辯護人得反於被告之無罪主張而進行有罪辯護。
- 協同意見論點：
  1. 關於辯護人之定位問題
  2. 關於為被告之利益之判斷
  3. 關於對被告之不利益主張之容許性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 (一) 日本之問題狀況

### 辯護人之固有權與被告之基本權的雙重性格

	實務	學說
辯護人之定位	為被告利益之誠實義務 ＝被告的代理人、保護者	少數（與實務同）
	為真實發現之在野法曹 ＝法的保護者（準司法機關）	
		多數： 以「為被告利益之誠實義務」為前提： 代理權＝被告的代理人（強調被委任者的角色：受本人意思拘束） 固有權＝被告的保護者（強調法律專家的角色：受律師職業倫理拘束）
受有效辯護之權利	法的保護者模式	被告的保護者模式
	辯護人之固有權＝法的保護者（準司法機關）	辯護人之固有權＝被告的保護者（強調法律專家的角色）
	被告之基本權＝被告的自我防禦權	被告之基本權＝被告的自我防禦權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 （二）我國之相關議論

1. 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保障說
2. 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與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說
3. 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說（排斥第16條）
4. 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與第16條訴訟權雙重保障說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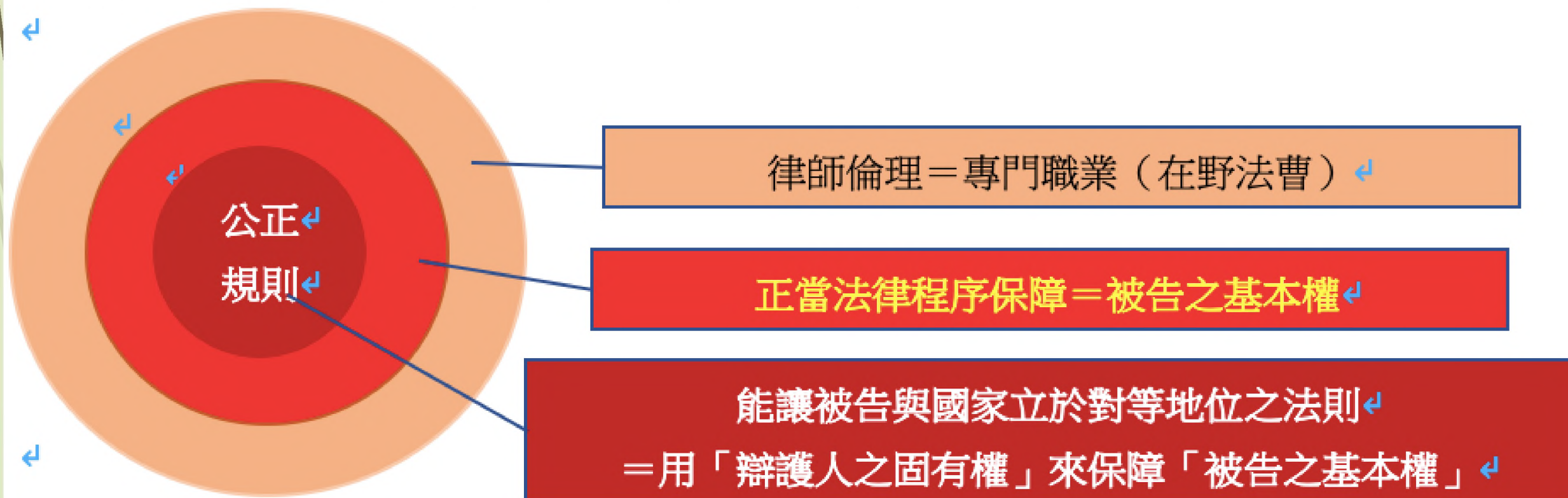
## (三) 分析

### ■ 本意見書採第四說（理由）

1. 第16條作為保障被告訴訟主體權之根據，在被告自我辯護權與辯護人辯護權相衝突之時，具有關鍵性的調和作用。
2. 辯護權之定性既然具有雙重性格，即同時有第8條所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之自由權性格，自己非單純的受益權，於此意義而言，自可避免作為一種受益權可能遭受國家政策或立法裁量左右之問題。
3. 單從16條為根據，無法正確地反應出辯護人之辯護權與人身自由保障之關係，此點觀日本國憲法第34條係歸屬於人身自由保護項下即可知之。從而，就辯護人之辯護權而言，自應同時援引我國憲法第8條以彰顯其具有人身自由權保障之本質。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基上所述，按照正圓理論，辯護人之辯護權之雙重性格，亦即被告之基本權與辯護人之固有權的關係可圖示如下：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 (四) 結論

- 辯護人之辯護權，非依附於被告之訴訟權，而係獨立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按辯護人行使辯護權，其之責務即在於「遵守公正規則（能讓被告與國家立於對等地位之法則）以捍衛當事人合法利益」，
- 辯護權具有辯護人之固有權以及被告之基本權的雙重性質，而具有獨立性。要之，辯護人之辯護權，作為一種固有權，即構成受有效辯護之權利之核心內涵之一柱，被告享有受辯護人辯護之權，則為另一柱。
- 在日本，辯護人之辯護權，有彼邦憲法第34條與同法第37條第3項所定為據；相對於此，在我國，並無類似條項可憑，惟考慮到辯護權之雙重性質，本意見書認為，應求諸於我國憲法第16條（訴訟權）暨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為據，藉此，一方面以訴訟權彰顯被告之程序主體地位，以明其乃係辯護權的受益主體，而就辯護人之固有權性質，則應求諸於第8條，以彰顯辯護人雖非受益主體，卻係行使主體，而其固有權之行使，乃係植基於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要求，以專門職業之法律專家資格，擔任被告的保護者之角色，以確保被告能與國家立於對等地位應訴臨訟。



# 一、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 （五）補論：關於律師職業自由（憲法第15條）

- 作為補論，爭點一中所提及律師職業自由，亦即憲法所保障工作權（我國憲法第15條），在日本就受有效辯護之權利的文脈下討論辯護人之辯護權的相關議論中，並未見有著墨者。
- 其理由無他，乃係因職業選擇之自由（日本國憲法第22條第1項參照），在基本權之屬性上，被定位為係屬於經濟的自由權，而彼邦實務、通說認為，相較於精神的自由，經濟的自由可以受到較高強度的公權力的規制。而彼邦實務、通說認為，日本國憲法第34條與同法第37條第3項，乃係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環以圖人身自由之保障，係屬於與精神的自由權並列匹敵之人身自由權。要之，兩者性質顯不相同，本難以相容，故而未有言及以律師職業自由為據者。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 題綱爭點二：

偵查中辯護人於檢察官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之在場見聞、筆記及陳述意見，是否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其憲法上依據為何？或僅屬法律上權利？（可分別就在場、筆記及陳述說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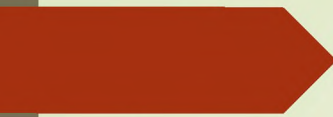
### \* 回覆意見二：

以結論而言，本意見書認為，「辯護人之偵訊（含警詢，以下同）在場權」（弁護人の取調立会権）乃係被告（含犯罪嫌疑人，以下同）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其保障射程，不限於在場見聞，包括在場筆記與陳述。又其依據應併同求諸於我國憲法第16條與第8條所定。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一）日本相關議論之借鏡價值

- 我國刑訴法第245條第2項前段，明定辯護人之偵訊在場權
- 日本法無明文
  1. 彼邦檢警實務，一貫地以恐有礙偵查而持否定見解
  2. 就一般論來說，雖皆肯認在場權就理論上而言有其必要性，然礙於法無明文，多半認為應以立法的方式解決。
- 不過，雖說日本現行法並無在場權的明文，然也正因如此，肯否兩論相爭不下，相關議論活潑噴發，而諸議論之檢討核心，則可歸結於「辯護人之偵訊在場權是否為憲法所保障之被告基本權」之上。此點，正好對應於題綱爭點二，可堪借鏡。為此，以下有必要先行回顧，日本之所以未有明文規定辯護人之偵訊在場權，有其歷史經緯與背景原因，藉此以明彼邦檢警實務對偵訊在場權堅定持否定見解之緣由與論據，與此同時亦能檢驗肯定論對之所為反論是否具有說服力。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二) 日本型偵訊手法之思維與在場權否定論

- 江戸口書
- 筆錄審判
- 精密司法
- 核心司法與可視化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二) 日本型偵訊手法之思維與在場權否定論

#### 實施日本型偵訊手法之必要性與堅實的否定論

1. 僅光有物證或是科學鑑定等，往往不足以特定犯人，因此有必要取得被告之供述
2. 收賄或受賄案件中，難以期待有客觀的物證，若是沒有取得被告的供述根本無法定罪；
3. 在組織性或計畫性犯罪之情形，也必須依靠被告的供述，才能釐清組織乃至於成員的地位以及角色
4. 供述證據乃係真相解明所不可欠缺者，因為被告有高度的蓋然性就是真兇，反而更有必要聽取被告的辯解才有可能儘早還其清白
5. 透過偵訊可以促使被告反省，此點，對於將來決定起訴或不起訴乃至於審判之進行中，對於自己行為之反省以及將來的更生，具有重要性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三) 基本權保障觀念下之肯否兩論

#### 1. 偵訊受忍義務否定說

##### (1) 偵訊任意處分說

##### (2) 偵查階段辯解權說（純粹任意處分說）

#### 2. 偵訊受忍義務肯定說（偵訊強制處分說）

#### 3. 輪值辯護律師制度實施後的肯定說大躍進

##### (1) 最大公約數：受有效辯護之權利與緘默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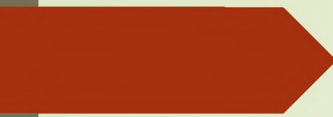
##### (2) 緘默權、受有效辯護之權利暨包括防禦權之綜合說

##### (3) 基本權保障與制度適法性條件雙重性質說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四) 從與緘默權之關係看我國的憲法解釋論

■ 為了確保嫌疑人係基於「自己決定」而決定保持緘默，在偵訊時有辯護人在場，給予適當的「援助與建議」被認為係最具有效果的手段。

■ 日本緘默權：係來自彼邦憲法第38條第1項（何人も、自己に不利益な供述を強要されない。）不自證己罪特權之保障。即於被告係屬緘默權，而於證人則為拒絕證言權。而有關不自證己罪在憲法上的理論根據，主要有以下四說：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四）從與緘默權之關係看我國的憲法解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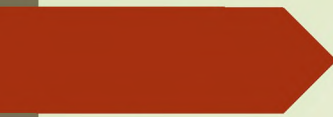
1. 三難困境說
2. 彈劾主義說
3. 隱私權說
4. 人性尊嚴說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四）從與緘默權之關係看我國的憲法解釋論

- 若採三難困境說，由於我國並不若日本有憲法上之明文規定（日憲法第38條第1項），故就我國憲法論而言，僅能求諸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以及憲法第16條（訴訟權所派生之訴訟主體權）。若採彈劾主義說，其核心在於維持國家與國民之間的公正的平衡，與本意見書前述之公正規則若合符節，因此其論據亦本當併同求諸於我國憲法第16條與第8條。若採隱私權說或人性尊嚴說，則其根據應求諸於我國憲法第22條為憑。
- 按本意見書一貫之立場，自應採取彈劾主義說，以貫徹辯護人行使辯護權之核心責務，乃係在於確保被告能與國家立於對等地位應訴臨訟（也就是維持國家與國民之間的公正的平衡）之中心意旨。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五）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 以上確認了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基本權性與憲法上依據，接著要處理者的是，爭點二所詢及，除見在場聞外，是否包括在場筆記及陳述意見保障射程問題。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 1. 陳述意見之可否

- 狹義說：在場的辯護人乃係擔任監視的角色。
- 廣義說：一般而言，學說多認為在場權之保護內涵有三，即(1)適當地與嫌疑人商討並給予建議，協助其正確地傳達供述的內容而不至於招致誤解，(2)就是否保持緘默給予建議，(3)對於違法、不當的偵訊方法提出異議。
- 最廣義說：另有認為，除前述廣義說所揭示之(1)、(2)、(3)外，還包括(4)若偵訊方之提問有曖昧模糊不清之處，可反質問，以臻明確，(5)代替嫌疑人回答偵訊方的提問。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在場	意見陳述	筆記
狹義	Yes	NO	NO
廣義	Yes	Yes	?
最廣義	Yes	Yes	?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五）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 2. 筆記之可否

如上所述，在日本，有關在場權之保障射程是否包括筆記，雖不明瞭；但有關受有效辯護之權利之內涵之一即接見交通權，是否包括筆記（含以紙筆乃至於電腦、平板等電子設備進行文字記錄之行為，不含照相攝影。），則有以下代表性實務見解可資參照：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 2. 筆記之可否

(1)東京高院2015年判決「刑訴法第39條第1項規定…，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交通權，即係遵循憲法第34條〔保障有效辯護〕之趣旨…而設，於此意義上，可謂係由憲法之保障而來的權利（平成11年最高裁判決參照）。…一審原告主張，照相攝影既然與筆記（メモ）一樣，皆係為了將情報予以記錄化之行為，因而自應包含在刑訴法第39條第1項所定『接見』之範圍內。但同條無法解為，只要是為了將情報予以記錄化之行為，皆當然包含於『接見』之範圍內。本來，辯護人為了將其與嫌疑人、被告進行接見（律見）時之接見內容作記錄以資備忘，通常就之後順利地進行辯護活動而言係屬必要，因此，像是筆記之類的方式，可謂為係在辯護人之接見交通權的保障之範圍內所應允許者。然而，如前所述，並非只要是為了將情報予以記錄化之行為，皆當然包含於『接見』之範圍內，筆記以外之將情報予以記錄化之行為是否應允許，應考慮到記錄化之目的以及必要性，其之態樣的相當性，律見現場並無其他第三人在場之情形若行該記錄化行為是否會招致危險性等諸般情事後來加以檢討。」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五）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 2. 筆記之可否

(2)大阪高院2017年判決：「（接著要）檢討秘密接見時依據本件使用電腦之情形，是否係屬秘密交通權之範圍內所保障之行為。…刑訴法第39條第1項所定秘密交通權，乃係屬於為了身體受拘束之嫌疑人、被告得以受到辯護人援助之刑事程序上最為重要的基本權，與此同時，對辯護人而言也是其固有權中最重要的一環（最高裁昭和49年（才）第1088号同53年7月10日第一小法廷判決民集32卷5号820頁參照），辯護人與本件嫌疑人、被告（被羈押），就一邊閱讀記載有關該當刑事案件之證據資料等情報之文書資料等並一邊討論之際，予以筆記，乃係辯護人為了充分遂行辯護活動所必要不可欠之部分，因此，有鑒於刑訴法第39條第1項保障秘密交通權之趣旨而論，秘密交通權應解為，並不僅止於口頭的討論，還包括一邊閱覽前述文書資料等一邊與被羈押者討論並記錄筆記等行為。而且，若有關該當刑事案件之證據資料等情報係以電子數位資料之態樣保存在電腦之情形，辯護人為充分遂行辯護活動之故，在其與被羈押者接見之際，將儲存在電腦的電子數位資料轉化為文字顯示於電腦螢幕，好一邊閱覽一邊討論，對辯護人而言乃係必要不可欠之事…（故）應可解為，將證據文書資料以電腦螢幕表示（轉化為文字等）以便閱覽，以及記錄筆記之行為，乃係包含於秘密交通權所保障之射程範圍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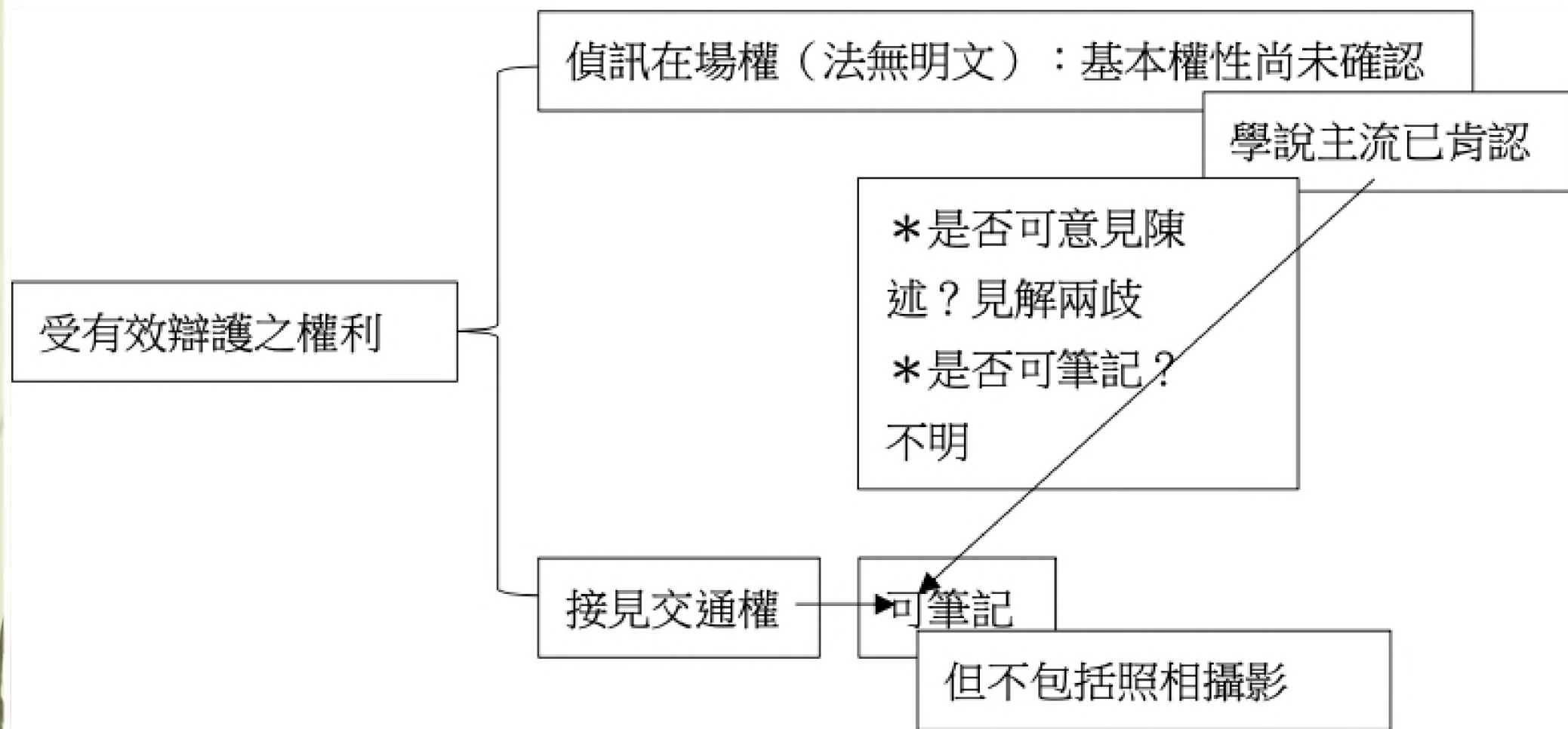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 3. 小結：受有效辯護之權利、接見交通權與筆記權

由上述可知，日本實務見解認為，秘密交通權（接見交通權）乃係源自於憲法所保障之受有效辯護之權利，乃係辯護人之固有權，被告之基本權。



基上所陳，日本議論狀況可具體化如下：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六）結論

- 就在場權，本意見書採學說主流見解，即肯認辯護人之偵訊在場權乃係被告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其在我國憲法上依據為緘默權（憲法第8條與同法第16條）、受有效辯護之權利（憲法第8條與同法第16條）暨包括的防禦權（憲法第8條與同法第16條）。
- 又作為基本權之偵訊在場權之保障射程，本意見書採最廣義說，即並不限於在場見聞，包括在場進行意見陳述。至於筆記之部分，本意見書認為，在肯認在場權之基本權性並採廣義說之前提下，記錄筆記乃係辯護人於偵訊在場之際，遂行辯護活動以達成憲法保障實質有效辯護所必要不可欠者，故自應肯認於偵訊在場權之保障射程範圍內。

##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六) 結論

- 按如前述，最廣義之在場權內涵有五，即(1)適當地與嫌疑人商討並給予建議，協助其正確地傳達供述的內容而不至於招致誤解，(2)就是否保持緘默給予建議，(3)對於違法、不當的偵訊方法提出異議(4)若偵訊方之提問有曖昧模糊不清之處，可反質問，以臻明確，乃至於(5)代替嫌疑人回答偵訊方的提問。要遂行此五點，記錄筆記乃係必要不可欠，其理，與前引日本實務肯認，辯護人接見時，其與嫌疑人進行商討、建議之時，以紙筆或電腦所為之隨時記錄筆記之行為，就其後的辯護遂行而言，乃係必要不可欠，其理係屬相同。
- 唯一不同者係，偵訊在場權之情形，在其與偵查秘密不公開之衝突的問題上，對偵查機關而言，似乎會遠高過於接見交通的情形。先不論這樣的看法是否正確，即便假設正確，此一衝突本身，其實並無法作為否定偵訊在場權之基本權性乃至於其保護內涵包括陳述及筆記等之論據。此處之關鍵，應係在於兩者發生衝突時，應如何予以調和之問題。

### 三、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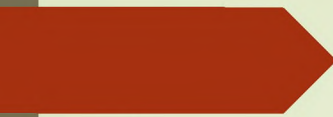
#### \*題綱爭點三：

檢察官於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限制或禁止其辯護人在場、筆錄及陳述意見之處分，是否應賦予辯護人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機會？抑或應於本案終局判決時認定是否違法，並作為證據評價之依據？如未賦予單獨救濟之機會，是否構成違憲？其憲法上依據為何？（可分別就在場、筆記及陳述說明之）

#### \*回覆意見三：

以結論而言，本意見書認為，對於檢察官違法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處分，雖亦當然應於本案終局判決時，判斷是否應予證據排除；然除此救濟方式外，於制度上，也應同時賦予辯護人有得「即時」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機會。如未賦予單獨「即時」救濟之機會，即會構成對受有效辯護之權利、緘默權乃至於包括的防禦權之侵害，而致違憲。又其於憲法上之依據，同樣係應併同求諸於憲法第8條與同法第16條所定。






### 三、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 (一) 問題之所在

- 按檢察官之所以於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限制或禁止其辯護人在場、筆錄及陳述意見，多係基於偵查秘密不公開之考量。此處問題之關鍵，即在於偵訊在場權與偵查秘密不公開原則相衝突時，應如何予以調和。而在救濟的問題上，也同樣地必須從兩者之衝突與調和之角度加以考量。





### 三、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 (二) 何謂「偵查秘密不公開」

- 第一層係禁止審前資訊不當公開（以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公平審判原則，並保障相關人等之名譽權或隱私權）
- 第二層係次偵查必要性之考量。

### 三、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三) 偵查必要性

#### 1. 日本有關接見限制之借鏡

■ 日本有關指定制度中所稱「偵查的必要」(捜査のため必要があるとき)

(1) 非限定說，又稱為「偵查全般說」

(2) 限定說，又稱為「物理的限定說」，還可進一步區分為廣義限定與狹義限定，通說採廣義說。

### 三、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 (四) 分析

- 若從以上限定說之立場，不論廣義說（通說）或狹義說，皆認為接見原則應屬自由，限制乃係例外，從而應採辯護權優位主義（蓋辯護權有基本權性，偵查權並無基本權性只有法律位階。）為前提。所差異者僅係，通說（廣義說）認為應以此前提來進行辯護權與偵查權之間的衝突調整；而狹義說，則更進一步認為，應以辯護權為優先，故應採取接見交通權優越主義，於此意義上，根本無所謂衝突調整之問題，而是認為接見交通權乃係絕對優越於偵查必要之憲法權利。反之，若從少數說，則辯護權與偵查權同屬於法律位階，理論面上並無優位主義適用之問題，但由於少數說認為應由偵查機關判斷是否有必要，所以實際的運作面上，必然演變為偵查優位主義之適用。
- 對此，本意見書從通說。

### 三、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 (五) 結論

- 基上所陳，有鑒於辯護權具有基本權性，屬於憲法位階，而偵查權僅係法律上的位階，故本意見書採用辯護權優位主義之理解。而所謂辯護權優位主義，係指其法位階優位，而非謂其乃絕對權利，故而仍有憲法第23條依據比例原則予以限制之適用。所謂偵查必要性必須在符合憲法第23條之情形（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方能對辯護權進行限制。據此，我國刑訴法第245條第2項所謂「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應解為，係指「以可匹敵」於「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情形為限。且有權限制或禁止者，並非檢察官，而係立於公正第三人地位的法院。



### 三、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 (五) 結論

- 按基於辯護權優位主義，既然只有法院有權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檢察官根本無此權限，若檢察官違法做此處分，即屬於無權處分，顯有重大之違法，而構成對受有效辯護之權利、緘默權乃至於包括的防禦權之侵害，於此意義上，自可於本案終局判決時作為是否為證據排除之考量依據。然僅此救濟而已，自仍有不足，對於此種遭致無權機關之違法限制或禁止處分，基於辯護權優位主義之思維，於制度上，也應同時賦予辯護人有得「即時」向法院（有權機關）請求救濟之機會。按本應處於基本權優位地位之辯護權遭到下位階之法律位階之偵查權的違法壓制，若未給予「即時」救濟之管道，即會導致基本權保障上無可回復之損害（詳見以下四之說明）。為此，在制度上即應給予單獨「即時」的救濟機會，乃係法治國原則根本之要求。於此意義上，如制度上未賦予此種單獨「即時」救濟之機會，而使被告「長時間」與國家立於「不對等地位」應訴臨訟，即係侵害受有效辯護之權利、緘默權乃至於包括的防禦權，而構成違憲。
- 至於受有效辯護之權利、緘默權乃至於包括的防禦權之憲法上依據，應併同求諸於我國憲法第8條與同法第16條所定，其詳如前所析，於此不贅。

## 四、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機制與實益

\*題綱爭點四：

（承上）如應賦予辯護人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機會，其具體可能之權利救濟機制為何？其救濟之實益何在？

\*回覆意見四：

若按爭點三之分析，基於辯護權優位主義，法院為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主體，以立法論而言，較妥適之作法，係在刑訴法第245條第2項限制偵訊在場權之情形，亦與我國刑訴法第34條限制接見通信權（即日本所稱接見交通權）之情形一般，應改為不得禁止，只能限制；且其限制，也應設有如第34條之1所示限制書一般的令狀制約。且作為對應之救濟，也應與限制接見通信權之情形一樣，可依據我國刑訴法第404條以及第416條提起抗告或準抗告。

## 四、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機制與實益 單獨即時救濟（抗告、準抗告）之實益

- 本應處於基本權優位之辯護權，卻遭到法律位階之偵查權的違法壓制，若未給予「即時」救濟之管道，可能導致基本權保障上無可回復之損害。
- 例如，像是辯護人一旦被禁止其在場，就會導致被告身陷孤立無援的窘境，一般人，在偵查機關軟磨硬泡下，往往「只好放棄緘默」。若此種「只好放棄緘默」的違法侵害狀態（此時被告與國家的地位已經失衡不對等），若無法獲得即時的救濟，等到案件終局判決時，才論斷其「只好放棄緘默」下的「自白」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此種非即時的救濟雖說聊勝於無，但對於被告之防禦權行使而言，無疑是一種為時已晚的救濟。